

“中国人素质低，所以中国不应当……”这句话如此广为传播，以至于如果前面少了“中国人”，而少了“低”，“素质”这个词都显得踉蹌少腿。

什么叫“素质”呢？直觉的解释是“文化水平”。最新人口普查显示，中国文盲率现在只有4.08%，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另一项研究显示，中国18.3%的25岁到34岁的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，高于捷克(15.5%)、土耳其(13.6%)、巴西(10%)等国家。可见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怎么也不算低。

如果“素质”指的不是文化水平，那恐怕就是指合作精神。据说中国人“一盘散沙”，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明证。

一盘散沙的社会，就是没有机油的机动车，开起来肯定稀里哗啦。有不少研究者指出，其实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一盘散沙。传统乡土社会有着严密的社会交往网络和自治传统。村里需要修个路、通个渠，各家各户常常商量着集资解决；张三和李四闹个矛盾，族长或者乡绅往往根据村规给评手……我在纽约的唐人街，看到已经离开故土上百年的中国社区，每到佳节，还聚在一起舞个狮子敲敲锣鼓，很难说中国人基因里缺少凝聚力。

“素质”要不就是指规则意识？中国人不爱排队，乱闯红灯……这些现象说明中国人素质低，所以，中国民众需要被“素质高”的精英群体管束起来。成龙大哥所言“中国人是需要管的”，大约就是这个意思。

我去过港台，也见过人口同样密集的港台市民自觉排队。他们也是中国人，说明规则意识这种“素质”，也不是一遇到中国人就发生排异反应。也许有人认为“素质低”的民众需要“素质高”的官员去教化管束，那么放眼官员的素质，不免叫人胆战心惊：今天可能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千万元而锒铛入狱，明天没准又看到强行拆迁逼得一个人上访自焚。如果某些官员经常在工程招标中玩内部交易、在土地纠纷中不尊重法律、公款吃喝屡禁不止……又怎么能指望“下面”恭恭敬敬尊重规则？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人，如何教化别人不要随地吐痰？

所以，就算中国人的“素质”有问题，它也是更多地源于某些制度原因。我当然不相信制度的变革可以在一夜间改变文化，但是，对僵化制度的变革，至少可以打开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，而公民素养的培养需要一个公共空间，就像学会跑步需要先解开脚镣。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，所以中国不应该如何的人，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“中国更应该……”。

（摘自《青年博览》2012年第10期 刘瑜/文）

我们什么时候能远离低俗

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突然发现低俗正悄悄向我们袭来，上自媒体，下至个人。譬如诺贝尔奖我们拿不到，就在媒体上炒作获得诺奖的是华裔。于是，我们中国人似乎也沾上了光。美国来了个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，有人发现他有中国人的血统，就断言他一定亲华。国内有演艺单位偶尔去了一次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，回来以后就大吹大擂说“征服了国外观众……”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

虽说媒体的报道不一定就代表着媒体自身的观点，但这种明显带有偏颇倾向的言论，其实媒体不理也罢。但既然选择刊登了，那就脱不了低俗的嫌疑。媒体如自身不浅薄，那为什么要帮衬着去炒作？

再说说个人。大庭广众，口无遮拦，自爆隐私，抖搂秘箱，上至床第之乐，鱼水之合，下至家长里短，生儿育女，欢乐此而不疲。显摆自己还嫌不够，又再窥及他人。见面先问：买房买车了否？媳妇、女婿是否白领？年薪几何？外孙、孙子是否上贵族学校，出国了没有？甚至提醒人家“对老人要多看着点儿”等等。看似热心，实则显摆，在热心之后意在抬高自己，全然不顾及别

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孔子在《论语·子路》里说的这句话常被引入引述。但是，对这句话具体涵义的理解常有许多不同，甚至存在一些曲解，有必要进行一番辨析。

我们先来看一下孔子的原意。孔子说的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主要是讲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。朱熹注曰：“和者，无乖戾之心；同者，有阿比之意。”大体上可以表述为：“君子尽管不苟同他人的观点，但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；小人尽管附和、盲从他人的观点，但不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。”然而，一些人在加以引述时，出现了某种过度阐释或者说明显曲解的情况。

曲解之一，对“不同”的性质不加区分，似乎无论什么样的“不同”都不影响保持“和”的关系。许多人都忽略了另一种“不同”，即异质的、对抗性的不同，而这类“不同”往往是不可调和的。如果无视异质“不同”的存在，一味幻想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”，在实践上肯定是有害的。

曲解之二，似乎“和”是不需要原则的。孔子所说的“和”，是在遵循礼制基础上的协调，是有原则的。做人须有原则，须明辨是非，是孔子的一贯主张，也

一件事情发生后，当很多人无法借助传统媒体来了解真相，却要借助于外媒报道，借助于微博上的碎片化信息去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事实时，传统媒体很难不被边缘化甚至被抛弃。当网上很多所谓传言一再被证实为并非捕风捉影，而传统媒体却看不到半点事实端倪时，网络在公众心中

很难不跃升为主流。每每看到一些传统媒体在热点新闻上的话语缺席，作为纸媒从业者都感到无比痛心，这完全是将话语权轻易拱手相让，这与舆论场的沉默，是在将信息传播的主导权让给另一个舆论场。事情一旦发生，是无法假装看不见的，毕竟当下的信息渠道是如此多元！

今年全国两会时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有一段精彩论述，他说：随着网络微博等的迅速发展，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“通讯社”，这对宣传部门是新的挑战。有点不好的地方就想捂住，反倒会越来越糟糕。现在发生问题的，大量还是第一时间没有权威声音，或者第一时间不准确，然后第二次第三次修补，造成一次次次的冲击波，越弄越被动。李长春同志希望国家转变思想观念，公开透明地应对。

国新办副主任王国庆在接受采访时也，批评过一些政府部门对负面新闻往往采取“捂住”而不让媒体公开报道的做法。他说，在信息传播还受到比较大局限的时候，瞒报还是可能的，但现在要想“捂

“和而不同”辨析

适用于对“和”的把握。当然，就人伦关系而言，封建社会基于礼制之“和”与现代社会基于人人平等之“和”是有质的区别的。但无论如何，“和而不同”的“和”，其涵义中是应当包含着符合公理、道义的原则的。

曲解之三，有意无意地把“同”与“和”对立起来。孔子讲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似乎是将“和”专属于“君子”，而将“同”专属于“小人”，这很容易使人产生某种误解，认为“和”与“同”是相对立的。事实上，“同”也不是与“和”毫无关系的。如果说“和”需要某种“不同”因素的话，同时也需要“同”的因素，而况且许多事物都是“异中有同”。“同”并不可怕，孔子本人就说过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的话。可以说，“同”是“和”的必要条件之一。就人际关系而言，如果毫无共同之处可言，要达到“和”是很难的。孔子所反对的“同”，仅仅是指那种无原则的、不辨是非曲直的“苟同”。因此，将“同”与“和”简单对立起来的认识是不正确的。（摘自《人民日报》7.5 边家珍/文）

住”新闻是越来越难了。假装看不见，并不会真让公众看不见，仅仅只是将传播权和主导权白白出让了。纸媒不关注，网媒会关注。假装看不见的结果，只会将问题越捂越大，甚至导致问题失控。比如，网络传播虽然很自由，但可能并没有人把关的传统媒体”那么规范，

将一两句话断章取义地提出来做成标题，将片面的图像剪裁贴贴出来，将事实扭曲，混乱和碎片化的传播中，事实会被越描越黑。而且，传统媒体的沉默，会使受到压制的舆论产生一种强烈的逆反心态。这种遮掩，向舆论传递的是一种此事“必有黑幕”的暗示。带着这样的情绪去解读，无阳光，无公信，无论此后政府作多少补救，公布何种“真相”，民众都难以相信。

媒体的监督，记者的暗访，媒体无障碍地报道，并不是官方的敌人，恰恰是在塑造官方的公信力。传统媒体不见新闻，表面上看是传统媒体失去话语权，其实，真正失去话语权的政府部门。

不要指责“不明真相”的民众过度依赖网络和微博。有事上微博，而不是看传统媒体，这不是媒体的悲哀，其背后是政府公信力的大问题。假装看不见，欺骗的只是自己的耳朵，牺牲的是自己的嘴。

（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7.4 曹林/文）

“文革”期间，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全国形势一片混乱，但当时人们听到的却是众口一词：形势一片大好。这显然是弥天大谎。

谈到说谎，我联想起了日前读到的《资治通鉴》记载的唐僖宗时蝗虫不食稼之事：秋七月，蝗虫自东而西，蔽日，所过赤地。京兆尹杨知至奏“蝗虫入京畿，不食稼，皆把荆棘而死”。宰相皆骂。蝗虫不吃庄稼，满朝弹冠相庆，这场面实在让人匪夷所思。不管宰相们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，反正摊上这样一群糊涂蛋，老百姓算是倒霉透了。蝗灾，在《新唐书》中，记录在册者共十八次。从唐高祖的武德六年，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二年、三年、二十一年，都发生相当范围的蝗灾。唐文宗李昂开成年间，共五年，隔一年就要闹一次蝗虫，遍及全国，为害无穷。“开成元年夏，镇州、河南、河北二年六月，魏博、昭义、淄青、沧州、兖海、河南、河内、魏博、德、滑、青、兖、海、河阳、淮南、魏、陈、许、汝等州蝗蝗害稼。占曰：‘国多邪人，朝无忠臣，居位食禄，如虫与民争食，故比年虫蝗’。”

自欺欺君，无过于蝗虫不吃稼。杨知至欺人，天子信之，宰相贺之，这大概是唐代君臣所创造的精神自慰法吧。这比起蝗灾救灾来看，当然省事得多。遮天蔽日的蝗虫，居然在僖宗所居的京师抱荆棘而死，可能是因为蝗虫之害怎么也比不上帝王之害，大概群蝗惭愧而死的吧！末世唐朝，国势日衰，主子也好，卿相也好，已经没有了直面灾难的勇气、全力抗灾的力量，只有寄托于侥幸，寄托于幻想。而当侥幸和幻想不足以掩盖这种满目疮痍的国家局面时，就只有寄托于谎言了。给《资治通鉴》作注的胡三省，注到这里，回顾唐代的历史说：“杨国忠以霖雨不害稼，韩冕以霖雨不败盐，今杨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而死，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其功，其来久矣！”至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“大跃进”运动，全国到处“放卫星”，吹牛、撒谎，说大话不脸红，也许就是“蝗虫不食稼”这类谎言的变种吧。（摘自《中老年时报》5.10 范群/文）

“可怕”的师专学历

我“学历羞涩”，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。尽管这所学校后来部分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（现首都师范大学），但我只念了两年专科，就分配到北京十三中担任语文教师。

至今我填写任何表格，上面若有“学历”一栏，只能老老实实地写明“大专”。

从北京师专毕业后到北京十三中任教，吸粉笔末有13年之久。之所以能写出《班主任》，当然与这13年的生活体验有关。

师专学历，中学教员出身，这是我的“软肋”，鄙我厌我恨我嫉我的人士，总是哪里软往哪里出拳。

宿命

“那么，1959年你考大学的时候，怎么就只考上了师专呢？”这是无恶意者常跟我提出的问题。很长时间里，我无法圆满地回答。

因为，在北京六十五中高中的时候，我的各科成绩一直不错。就在高考前两三个月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《小喇叭》节目播出了广播剧《咕咚》，那剧本就是我编写的。而在那以前，高二的时候，《读书》杂志刊出我一篇书评谈（第四十一），到高三，我的短诗、小小说，常见于《北京晚报》副刊版。是高考时失误了吗？考完后，对过标准答案，挺自信的。是志愿填得不合理：很可能是这个原因吧。我们那一代青年，以服从国家分配为己任，只考上个师专，倒霉，但还是乖乖地去报到。记得收到师专录取通知书那天，我拿给母亲看，她说了句：“我总觉得我的孩子能上北大。”我伤了母亲的心。然而最深的痛楚还是在我的身上。

上师专，教中学，这也许是我的宿命。

告密

1996年春天，六十五中高中班同学里的热心人，

组织老同学聚会，地点是在当年班长李希菲家里。

过了午，李希菲把我单独叫进房间，还关上门。“你

饥饿岁月里的“吃相”

果，通常称为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“饿”字，与“吃”有关的故事、轶事源源不断涌现出来。

由于我从事的是“涉外”工作，供应再差，对外总还要撑面子，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，特别是招待会，还是颇为丰盛的。于是就发生有趣的现象，过去我们为外宾举行招待会，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，往往发出请柬到不了几成，因为他们都很忙。而在“困难”期间，只要有宴会、宴会，那些忙人、要人有请必到，十分踊跃。在那种冷餐会上，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，大家一拥而上，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。有一次周总理在场，我亲自见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，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：“注意点吃相”！

我们接待外宾往往需要请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或专家来同外宾虚谈，讲解有关国情和政策。有一位某经济单位的负责人，专业水平高，情况熟悉，一些数字如数家珍，口才又好，还懂外文，每次谈话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满意，所以在我们单位组织虚谈的名单中他总是首选。可以想见，他是大忙人，平时特别难请。但就在那段时期，却一点架子没有了。

因为他烟瘾很大，那时没有禁烟之说，接待外宾除茶水外必摆香烟，而且一定是好烟，规格高一点的有时还有点心、水果。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冲着那中华烟而来的。不但在谈话中不断地抽，等送走外宾后，桌上剩下的都放进口袋。不仅他一人如此，外宾离去后香烟上某些私人的口袋已是公开的惯例，总务部门都视中方来什么人而有所准备。（摘自《书屋》资中筠/文）

1948年我结婚时正值战争年代，得过且过，婚事简办。新房里必不可少的一张床，还是我父亲用过多年的旧铁床，两侧床架铁管上油漆脱落、锈迹斑斑。我铲去锈斑，涂上几两散装漆，旧床翻新，成了新房里一件像样的家具。后来床上多了个孩子，床架又有了一丝锈斑，我也没工夫去打理它了。不料在上个世纪50年代，这张睡过我家三代人的旧铁床却招来了一场风波。

那时社会上掀起“大炼钢铁”的热潮，凡是带铁的东西都被搜罗一空，石库门上的铁环，弄堂口的铁门，还有晒台上晾衣服用的衣架等，都被拆下来投进“炼钢炉”。

炼钢炉的肚子是永远填不饱的，公用场所带铁的东西都被拆光后，就转向居民家里。有一天，3个里弄干部来到我家，动员我把这张铁床卖给废品收购站，以支援大炼钢铁。我表示为难，因为家里只有这张铁床，卖掉了全家人怎么睡？不料，一个年轻干部竟不屑一顾地说：“这有什么难处，把棕棚放在地板上不照样能睡！”听了这般不近人情之语，我一时竟答不上话来。倒是一个有些岁数的女干部，觉得这样说确实不妥当，就开导我说：“办法总是有的，可以去买两条长板凳来替代床架子。只要把棕棚往上一搁，不就是一张床了？”

那年头社会上什么东西都供应紧张，木制品更

“可怕”的师专学历

知道高中毕业后你为什么没考上好大学吗？”李希菲问我。她细说端详。原来，起因是《风雪夜归人》！1957年夏天，那时上高二，一天中午，在教室里，我和一些中午不回家的同学闲聊，我说到北京人艺演出的《风雪夜归人》如何精彩，正在兴头上，忽有一同学截断我说：“你别吹捧《风雪夜归人》啦，吴祖光（该剧作者）是个大右派！”

据说，当时我说出了这样的话：“是吗？吴祖光是右派？啊，吴祖光要是右派，那我也要当右派！”这样的言论，事后被那个同学汇报给了组织。1959年高中毕业前夕，要给每一位同学写政治鉴定。那一年，对于政治上有问题的毕业生，在鉴定最后要写上“不宜上大学录取”字样。李希菲虽然不是政治鉴定的执笔人，但写每个人的鉴定时，作为可信赖的青年团员、班长，她在场。

她见证了那一刻：因为有过我说过“吴祖光要是右派，那我也要当右派”的文字材料，于是，我的政治鉴定的最后一句就是“不宜大学录取”。我听得发愣，她却意犹未尽，跟我说：“你知道是谁揭发你的吗？我清楚。你要我告诉你吗？”我立即制止了她。现在回想往事，我甚至想深深感谢那位告发我的同窗。如果不是他或她的告发，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生命轨迹，我如果没有上师专，没当中学教员，后来又怎么写得出成名作《班主任》？

（摘自《风雪夜归正逢时》刘心武/著）

“可怕”的师专学历

父亲（胡耀邦）认为，端正党风不仅是党员干部的事，党员干部的子女也应为之努力。然而，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职务的方便，不法经商牟利，在群众中引起了越来越大和极其不良的影响。

那是1985年，一份涉嫌一名政治局委员儿子案件的请示报告送到了父亲面前。报告写道：侦查人员因不能进

胡耀邦下令 搜查政治局委员家

人首长驻地而无法找到当事人，也无法取证，以致案子长期搁置。报告要求：搜查涉嫌人居住地，以便找到嫌疑人与案件有关的线索，完成对整个案件的侦查工作。

不知道父亲有没有注意到，当时竟无人对这个报告作出批示。他却毫无顾忌地批道：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。

有关部门还是考虑到了那位领导的身体，为了避免突然情况而引发意外，中央办公厅安排公安人员在那位领导到中央书记处开会时，前往其家进行搜查取证。办案人员当天就从当事人房间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币现金，面对用麻袋装着的赃款，公安人员带走了当事人。

执法的严肃无情，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南海，也第一次震动了中国领导的最上层。

（摘自《思念依然无尽——回忆父亲胡耀邦》满妹/著）

作为外交部翻译室的“翻译国家队”成员，施燕华、张维为、高志凯等只要回忆起曾经陪同过的领导人，便眉飞色舞。张维为觉得，现在的翻译工作，没有以前那么困难了。比起邓小平那代领导人，现在的“领导人讲话规范得多”。“邓小平和李先念这样的领导人会见外宾，都没有讲话稿”，因而在事先准备之外，现场的判断很重要。

事实上，即使事先有所准备，领导人各具特色的乡音，还是常让翻译们“犯迷糊”。“华国锋的山西口音太重，有时我听不懂；叶剑英的广东普通话，那就更难听懂。而李先念的湖北红安话，差点令施燕华出洋相。”张维为说。

一次，李先念在接待外宾时，说到了日本。他的口音里，“日”和“二”的读音相近。施燕华当时刚刚看过内部放映的日本电影《山本五十六》，以为“二本”也是个日本政治家或者军事家的名字。但是听着听着，越来越觉得不对劲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说的是“日本”。

即便是邓小平的“四川普通话”施燕华认为已是非常好懂的了，也不免有听力盲点：在四川话里，四、十二分，因此在邓小平讲到这两个数字时，施燕华一般用猜。“如果我觉得是四，就说‘四’，同时伸出四个指头，如果不对，他（邓小平）就会说‘不对，是十’。”

张维为也有过类似的尴尬。邓小平一次会见外宾时说到“失误”这个词。由于发音类似“十五”，整个句子的意思连不上，张维为一时愣了。坐在一旁的时任外交部部长的吴学谦是张维为的上海老乡，忙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告诉他是“失误”。

朱彤曾做过江泽民、李鹏的随行翻译，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时，每每谈到三峡工程，其中涉及的发电量常常用千瓦作为计量单位，而国际通用单位则是兆瓦。朱彤就常常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道心算题，换算成兆瓦计数后，再译成英文。

另一次，李鹏和外宾谈到中国的棉花产量时，使用“万担”作为单位。这次，朱彤可不像换算“千瓦”那样游刃有余了，而李鹏看愣住了的朱彤，提起笔自己换算了起来。朱彤的同事张建敏还因为翻译中的不准确，被严谨的朱镕基“抢白”。那是朱镕基在新加坡演讲后回答听众提问时，有人向朱镕基反映在中国打官司时遇到的困难，朱镕基回答：“你反映的问题，我会告诉法院，由他们处理。”张建敏将此句译为“I will instruct the Supreme People’s Court to handle it（我会指示高级人民法院处理此事）”，话音未落，就被朱镕基纠正：“I cannot instruct the court. They are independent（我不能指示法院，他们是独立办案的）”。

（摘自《文史博览》2011年第12期 薛田/文）

28

28

28

28

28

28

28

28

28

28

28

28

28

28

28